

插图本中国文学小丛书

44

苏轼

莫砺锋 童 强 著
春风文艺出版社

06
:44



苏轼。诗、文、书、画无所不通，无所不精，是中国历史上伟大的文学家、艺术家。本书从纵横两个方面入手，一方面具体、详尽地介绍了苏轼主要的生平事迹，特别细致地描述了他的为人品质和性格特征；一方面结合他的生活实际，具体介绍了他的文学创作情况，并且在深入分析当时的社会文化背景以及家世文化传统的基础上，精要地分析了苏轼的文学创作成就。这样，本书不仅向人们展示了苏轼的生活经历和人格特征，而且又对其文学创作进行了精审而全面的阐释。

ISBN 7-5313-1999-3



9 787531 319993 >

ISBN 7-5313-1999-3/1 · 1737 定价：6.00元





莫砺锋(右) 1949年生，江苏无锡人。1984年毕业于南京大学，获文学博士学位。现为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著作有《江西诗派研究》、《杜甫评传》、《推陈出新的宋诗》等等。

童 强(左) 1961年生，祖籍浙江绍兴。1994年毕业于南京大学中文系，获文学硕士学位。现今在南京大学中国思想家研究中心工作。主要著作有《情韵并美的宋词》等。

目 录

- 引 言 / 1
- 一、发硎初试的少年英才 / 2
- 二、凤翔：东坡体的形成 / 12
- 三、宦海风波的磨炼 / 23
- 四、江山胜迹与人生感慨 / 29
- 五、众望所归的文坛领袖 / 41
- 六、乌台诗案：批判的锋芒 / 47
- 七、黄州：逆境中的创作高峰 / 54
- 八、儋州：精神的归宿地 / 7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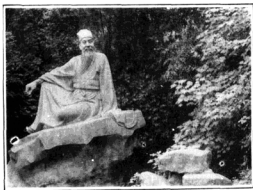
引 言

苏轼是宋代成就最高的文学家，在整个中国文学史上，其地位也是十分突出的。自宋代以来，对他的评价一直很高。宋人称：“苏轼文章为天下第一。”（宋·范祖禹：《荐讲读官札子》）《宋史》卷三百三十八《苏轼传》中称赞他的创作“浑涵光芒，雄视百代”；即使是当时的政敌，也不得不称苏轼“诚天下之奇才”（宋·王巩：《甲申杂记》）。清人李调元说：“余雅不好宋诗而独爱东坡，以其诗声如律吕，气若江河，不失于腐，亦不流于郭。由其天分高，学力厚，故纵笔所之，无不精警动人。”（《雨村诗话》卷下）清代赵翼极力推崇苏轼的才气和学力，称他“才思横溢，触处生春。胸中书卷繁富，又足以供其左旋右抽，无不如志。其尤不可及者，天生健笔一枝，爽如哀梨，快如并剪，有必达之隐，无难显之情，此所以继李杜后为一大家也。”（《瓯北诗话》卷五）还是让我们把这些赞美先放在一边，真正走近苏轼，走“进”苏轼，来理解他的作品、感受他的人格、面对他的心灵。

一、发硎初试的少年英才

苏轼(1037—1101),字子瞻,号东坡居士。眉州眉山(今属四川省)人。他的家庭富有文学传统。祖父苏序喜好读书写诗。父亲苏洵少年不喜学,年已壮时,犹不知书,直到二十七岁,才发愤读书。但是几次应试都未能成功,于是绝意功名,自托于学术,终于成为一位古文名家。后来到了京师,一时后生学者,皆尊其贤,学其文,以为师法。苏洵对苏轼和其弟苏辙的学习成长给予了悉心的指导,并为他们顺利地通过科举考试、进入仕途尽力铺平道路。

苏轼的母亲程氏是大理丞程文应的女儿,有知识而且深明大义,常常以古代志士的事迹激励孩子,砥砺名节。在苏轼幼年时,母亲就为他讲述《后汉书·范滂传》。范滂是东汉名士,少砺清节,后为清诏使,“登车揽辔,慨然有澄清天下之志”。终因党锢之祸而被宦官杀害。事发,汉灵帝大诛党人,他不愿牵累别人,镇静自若地去自首。临行,他让母亲“割不可忍之恩,勿增感戚”,母亲答曰:“汝今得与李(膺)、杜(密)齐名,死亦何恨!既



四川眉山“三苏祠”苏轼雕像

有令名，复求寿考，可兼得乎？”苏轼在一旁听得很受感动，就问自己如果做了像范滂那样的人，母亲同意吗？程夫人坚定地回答说，你能成为范滂，我为何不能成为范滂的母亲呢？苏轼很受鼓舞，“奋厉有当世志”。（苏辙：《亡兄子瞻端明墓志铭》，《栟城后集》卷二十二）母亲的教育影响了苏轼的一生。

苏轼八岁时入乡校，跟着老师天庆观道士张易简学习。三年以后又由父母亲指导他读书。他学习很用功，进步很快。平时除了读书作文，他还钻研琴棋书画等艺术，特别喜爱书法和绘画。对书法，他是“幼而好书，老而不倦”（《亡兄子瞻端明墓志铭》）；对绘画，他也是到了“轻死生而重画”（《宝

绘堂记》，《苏轼文集》卷十一，下文简称《文集》）的程度。少年时代的热爱为他日后在这两方面的成功奠定了基础。

他的少年生活充满了只在乡间田园中才有的自然情趣。在日后的诗文中，他经常回想起来这段生活。他说：“我昔少年日，种松满东冈”（《戏作种松》，《苏轼诗集》卷二十，下文简称《诗集》）；“我时与子皆儿童，狂走从人觅梨栗。健如黄犊不可恃，隙过白驹那暇惜。”（《送表弟程六知楚州》，《诗集》卷二十七）他或与群童于堂下嬉鸟，或与弟兄游水登高。一边读书，一边放着牛羊的情景更是令其难忘：“我昔在田间，但知羊与牛。川平牛背稳，如驾百斛舟。舟行无人岸自移，我卧读书牛不知。”（《书晁说之〈考牧图〉后》，《诗集》卷三十六）夜幕降临，坐在老尼的身旁听着她讲述蜀主孟昶和花蕊夫人浪漫而忧伤的故事。这种宁静、质朴、充满情趣的生活对一个古典时代的诗人的成长是很重要的。

苏轼十二岁那年，与同伴们“凿地为戏。得异石，如鱼肤温莹，作浅碧色。表里皆细银星，扣之铿然，试以为砚，甚发墨”（《天石砚铭并序》，《文集》卷十九）。此石虽无贮水处，可苏轼父亲还是称此石为天砚，亲自刻了一个木匣盛放，让他好好保存，并说，这是文字之祥。苏轼也很珍爱这方石砚，可是后来他因罪下狱，家属流离，书籍散乱，当他贬到黄州时，怎么也没能找到那方天砚。几年之后，当他乘船到当涂时，偶尔打开自己所携的一只书

箱，却又令人惊喜地发现了石砚。失而复得，苏轼更加喜爱自己的这方石砚，亲手交给自己的两个儿子，让他们好好保存。

当苏轼二十一岁出蜀进京时，他已是“学通经史，属文日数千言”（《亡兄子瞻端明墓志铭》），在学识修养方面都相当成熟了。苏洵看着自己的两个儿子在文学方面的成长，心里十分欣慰，同时也深感应尽快让他们参加科举考试，取得功名，而不再像自己一样成为“湮沦弃置之人”（苏洵：《上张侍郎第一书》）。苏洵与成都府尹张方平相善，于是携轼、辙出入其门下，并且请他写信向韩琦、欧阳修推荐。

嘉祐元年（1056）三月，苏轼兄弟跟着父亲第一次离开蜀中，经阆中（今属四川）、出褒斜（今陕西勉县北）、越秦岭、过关中，从陆路到达汴京（今河南开封）。按照当时的规定，进士试分为府试、省试（即礼部试）和殿试三次考试。苏轼兄弟顺利地通过所有的考试，中了同榜进士。礼部的考试由文坛盟主欧阳修主持，欧阳修对当时文坛流行的诡异艰涩的文风颇为不满，所以他一方面在文坛上倡导一种平实晓畅的文风，另一方面也通过考试的甄选，标举新的风尚。此时梅尧臣也任考官，他读了苏轼《刑赏忠厚之至论》后，特意交给欧阳修看。“文忠（欧阳修）惊喜，以为异人”（《亡兄子瞻端明墓志铭》），准备取为第一。当时的考卷都是糊名，考官不得知道答卷作者。欧阳修生怕这份考

卷是自己的学生曾巩的，为了避嫌，故把这份答卷取为第二。礼部复试时苏轼中了第一，殿试也中了第一等“进士及第”（宋太宗朝以后列“进士出身”、“同进士出身”为第二、三等）。苏轼赶紧写了书信感谢诸考官。欧阳修“读轼书不觉汗出”，说：“快哉，快哉！老夫当避路，放他出一头地也。可喜，可喜！”（欧阳修：《与梅圣俞》）又说：“三十年后世上人更不道著我也。”（宋·朱弁《曲洧旧闻》卷八）宋代文人大多有强烈的结盟意识，文坛上几乎每个时期都出现了领导风气的盟主。各个时期的盟主之间还存在着类似禅门宗祖衣钵相传的承继关系。此时苏轼刚刚崭露头角，欧阳修就已经感到可以把将来文坛盟主的责任交付给苏轼。

不幸，苏轼母亲程氏在家病逝，于是父子三人回蜀奔丧。等到他们第二次出蜀赴京时，已经是嘉祐四年（1059）十月了。这次他们是乘船从岷江、长江水路进京，并于次年二月到达京师。从长江顺流而下，沿途可以欣赏到各种山川美景。面对秀美壮丽的山河，苏轼写下了不少诗篇。这些诗歌拉开了苏轼一生诗歌创作的序幕。经过嘉州（今四川乐山）时他唱道：“故乡飘已远，往意浩无边。……奔腾过佛脚，旷荡造平川。”（《初发嘉州》，《诗集》卷一）气韵洒脱的诗句透露出年轻的诗人宽阔的胸怀和对未来的希望。在宜宾（今属四川）看到川黔接壤处不知其名的一片乱山时，他吟道：“江寒暗不知，远见山上日。朦胧含高峰，晃荡射

峭壁。横云忽飘散，翠树纷历历”（《过宜宾见夷中乱山》，同上）；“瘦岭春耕少，孤城夜漏闲。”（《戎州》，同上）在渝州（今重庆市）看江水：“舟经故国岁时改，霜落寒江波浪收。”（《渝州寄王道矩》，同上）船至夔州（今四川奉节），方入三峡，更是“长江连楚蜀，万派泻东南。合水来如电，黔波绿似蓝。余流细不数，远势竞相参。入峡初无路，连山忽似龛”（《入峡》，同上）。从这些诗句中可以看出年轻的苏轼细致敏锐的观察力和颇为厚实的表现力。特别是《江上看山》（同上），笔锋流畅生动，气势雄劲而不失蕴藉，已经初步显出了苏诗风格的主流。其诗曰：

船上看山如走马，倏忽过去数百群。
前山槎牙忽变态，后岭杂沓如惊奔。
仰看微径斜缭绕，上有行人高缥缈。
舟中举手欲与言，孤帆南去如飞鸟。

出了三峡，便到了江陵（今属湖北）。这一路上许多的名胜古迹，如屈原塔、八阵图、神女庙、昭君村、虾蟆碚、三游洞等都在激发着他们的灵感，他们留下了不少诗篇。后来苏氏父子把这次旅途中所写的百首诗歌，编为《南行集》以作纪念。其中苏轼的诗有四十首。

到达江陵之后，改从陆路北上。经过襄阳（今属湖北），过唐州（今河南唐河）、许州（今河南许昌），最

后抵达汴京。他们这一路北上，自秋至冬，在到达京城时，虽是二月，可却正赶上北方的漫天大雪。在距京城九十来里的一个叫尉氏的地方，苏轼独自一人被大雪封困在驿站，正在他对火枯坐之时，门外拥雪闯进来一个黑脸汉子。汉子邀苏轼一道饮酒，两人对饮甚欢，大醉而眠，第二天一早汉子骑马南去，望着客人的背影，苏轼才想起来还没有问过那人的姓名。苏轼有诗专咏此事，诗题曰：《大雪独留尉氏，有客人驿，呼与饮，至醉，诘旦客南去，竟不知其谁》（《诗集》卷二），文字简洁传神，有如一极短的散文。诗曰：

古驿无人雪满庭，有客冒雪来自北。
纷纷笠上已盈寸，下马登堂面苍黑。
苦寒有酒不能饮，见之何必问相识。
我酌徐徐不满觥，看客倒尽不留湿。
千门昼闭行路绝，相与笑语不知夕。
醉中不复问姓名，上马忽去横短策。

在苏轼的笔下，行客的举止闪动出唐传奇中游侠的身影。行客的豪爽在某种程度上正是苏轼自己性格的极好写照。

苏轼的性格非常豪爽磊落、奔放不羁。知子莫如父，父亲苏洵对苏轼的个性十分了解，他称其子“进趋拜跪，仪状甚野，而独于文字中有可观”（苏洵：《上张侍郎第一书》）。张方平后来也称他“性

资疏率”(张方平:《论苏内翰》)。苏轼的这种个性,从某种意义上讲,构成了他俊迈雄放的诗歌风格的基础,至于苏轼以自己一系列的词作开创出豪迈刚劲、倾荡磊落如天风海雨般的豪放词风,同样与他的个性分不开。但是,他的这种性格,加上他卓尔不群的才气却往往在现实中给他带来了很多的麻烦。他在凤翔做官时,上司是陈希亮(公弼),苏轼“年少气盛”,“屡与公争议,至形于言色”(《陈公弼传》,《文集》卷十三)。苏轼自己也说:“余性不慎言语,与人无亲疏,辄输写肺腑,有所不尽,如茹物不下,必吐出乃已。而人或记疏以为怨咎。”(《密州通判厅题名记》,《文集》卷十一)苏轼在青年时代已经形成了比较成熟的政治观点和政治理想,由于他的这种强烈的个性和人格的独立性使得他能够在各种艰难的环境中,坚持自己的观点,从不随波逐流,并且刚正嫉恶,遇事敢言。王安石实行新法,苏轼如果“少加附会,进用可必”(《杭州召还乞郡状》,《文集》卷三十二),但是,他没有那么去做,而是给变法提出了许多批评,结果遭嫉入狱,险些丧生。到了旧党司马光为相时,苏轼回到朝廷,他不仅被目为旧党一员,而且与司马光交契最深,本可以官运亨通,可是他却坚持自己的立场,批评司马光等人“专欲变熙宁之法,不复较量利害,参用所长”(《辨试馆职策问札子二首》其二,《文集》卷二十七)的过火的做法。苏轼的态度引起了司马光等人的强烈不满,一时间他非常孤立,不得已再次外

任。苏轼绝不是那种唯唯诺诺的人，对于看不惯的事情，他一向是快口直言。宋人蔡絛在《铁围山丛谈》卷四中说：“东坡公元祐时既登禁林，以高才狎侮诸公卿，率有标目，殆遍也。”实际上苏轼并非只是“狎侮”，在他的戏谑狎侮之中，更多的是强烈的讽刺、愤世嫉俗和满肚皮的不合时宜。这一点在他与程颐的关系中可以看得很清楚。苏轼在朝廷里任翰林侍读学士时，程颐只是崇政殿说书，官位比侍读低。两职都可以为皇帝讲书。可是程颐一定要遵循尊师重道的古礼，坚持在殿上给皇帝讲书时坐讲，俨然以师道自居。苏轼认为不合常情，大加讥诮。司马光死时，官员们要去吊唁，可是他们刚刚参加完一个庆典，程颐认为一天之内又歌又哭与古礼不合，故不可行，苏轼嘲笑程颐“此乃枉死市叔孙通所制礼也”，众人闻言皆大笑不已。苏程二人也由此结怨（《太平治迹统类》卷二十三）。两人的争议反映出苏轼对待事情通达、现实的态度。

苏氏父子三人到了汴京后，礼部任命苏轼为河南府福昌县（今河南宜阳县西）主簿。主簿的职责主要是办理文书等事宜。苏辙也被任命为澠池县（今属河南）主簿。但是他们都没有去上任，而是在准备“制科”考试，这是一种皇帝特别下诏举行的考试。嘉祐六年（1061）八月，在欧阳修的推荐下，兄弟二人参加了秘阁的制科考试，苏轼参加了“贤良方正能言极谏科”的考试，作了《王者不制夷狄

论》等六论。之前秘阁的考试皆不起草，故文多不工，自苏轼开始，可以先起草，所以苏轼的六论“文义粲然，时以为难”（《亡兄子瞻端明墓志铭》）。殿试时，苏轼以《御试制科策》考入第三等。苏辙考入第四等。第三等是宋代的最高等，入宋以来取入第三等的只有吴育（1004—1058）和苏轼两人，苏轼以后北宋的六七十年里也只取了范百禄和孔文仲两人。考试结束后，苏轼被任命为大理评事、签书凤翔（今属陕西）府节度判官。大理评事是负责刑狱的京官；签书判官是州府里掌管文书、佐助州官的官员。苏辙也被授官。

二、凤翔：东坡体的形成

苏轼兄弟联名高中，社会显达和文坛宿儒对苏洵又颇为推崇，于是“三苏”名震京师。老苏免试起用，留京编纂礼书，苏辙留侍左右。苏轼告别了父亲和弟兄，起程前往凤翔任职。

苏轼学识渊博，思想敏锐而通达，在北宋三教合一的思想氛围中欣然接受儒、道、释三种思想的影响，融会贯通，如鱼得水。在他早年的读书生涯里，“初好贾谊、陆贽书，论古今治乱，不为空言。既而读《庄子》，喟然叹曰：‘吾昔有见于中，口未能言。今见《庄子》，得吾心矣！’……后读释氏，深悟实相，参之孔墨，博辩无碍，浩然不见其涯也”（《亡兄子瞻端明墓志铭》）。自少年时代起，他就奋厉有用世之志，一生出处，充分体现出他的积极的人世精神；另一方面，他又濡染佛道，具有超然游于物外、旷达出世的胸怀。苏轼读《庄子》，“以为庄子盖助孔子者”，庄子对孔学的态度是“皆实予，而文不予，阳挤而阴助之”（《庄子祠堂记》，《文集》卷十一），他又认为“儒释不谋而同”，“相反而相为用”（《南华长老题名记》，《文集》卷十二），于此可见苏轼的

思想具有以儒家学说为主导而又灵活地参用释、道思想的特点。

尽管有很高的文学天赋，但是苏轼首先想到的并不是要成为一位伟大的诗人，而是要成为能够治理天下的政治家。他在少年时代就通过石介的《庆历圣德诗》了解到当代范仲淹、韩琦、富弼、欧阳修四位杰出的大臣，他从那时起就十分敬仰这四位“人杰”。北宋建国以来不断积累、日趋严重的社会、政治、经济等问题以及民族矛盾都在激发着青年苏轼参预到社会治理和改革的潮流之中去。在参加制科考试前，他就上了二十五篇《进策》；考试时，又作有六篇政论文章；在凤翔任上，他又进一步写了《思治论》。这些文章反映了苏轼对当时的社会形势、社会问题以及如何实施改革有过一个比较全面细致的思考。在这里形成的一些观点是他“深思极虑”（《策总叙》，《文集》卷八）的结果，也是他青年时代政治思想的一次总结。这是他一生中政治观点的基础，也是其出发点。应该说，王安石、司马光和苏轼都想对当时的社会政治进行不同程度的改革，但是他们的策略和侧重点不尽相同。从苏轼后来与王安石、司马光新旧两党之间的分歧中可以看出，苏轼的政治观点是经过了他独立的思考，深入的观察所形成的，具有自己独特的见地，绝非人云亦云。不少文论家都指出苏轼的文风深受《战国策》的影响，殊不知苏轼更重要的是把《战国策》作为一种治国经验来研